

60752/8914

0165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浅论历史“周期律”

李振民

西北大学

1991年7月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从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周期律”的谈话说起,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乃是现代中国的历史性选择。着重阐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以她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特有的政治素质等原因,不会受“周期律”的支配,一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克服困难,迎接挑战,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但同时仍要警惕“周期律”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70年的战斗历程。星移斗转，沧海桑田，70年的巨大变迁，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回顾在那江山未定的艰难岁月，一些好心的朋友就敏锐地看到了代表新生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必将胜利，但是，不免又为共产党一旦掌握政权，究竟能够维系多久表示担忧。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和毛泽东同志的一席谈话，就表现了这种担忧。黄炎培在谈话中坦率地提出了他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①。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总有一个周期律的支配力，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微笑作答：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能够跳出周期律的支配。今天，当党历经千锤百炼，进入“不逾矩”之年，已经基本掌握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并且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重温建国前这次谈话，不能不给人以更多的启示和力量。

怎样看待历史“周期律”

人类历史的发展究竟有没有一个周期律的支配力，这是似乎清楚但又带有几分朦胧的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什么是周期律？周期律是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一。周期是指事物在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中，某些特征多次重复出现，其连续两次出现所经过的时间。或者说物体作往复运动，重复一次所经历的时间。在自然科学的范畴中，周期律的内容是：元素的性质随着元素的原子核所带的正电量的递增而产生周期性变化。周期律作为物质运动的一个基本规律，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否适用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历史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阶级冲突间，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前进的。恩格斯指出：“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他解释说：“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走向衰落和灭亡的。”^②这个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概括，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基本出发点。当然，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并非一个绝对的公式，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作过不少论述。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③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少文章，多角度地对此作过剖析，阐释了历史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这些我们暂且不论，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的道路曲折,形式多样,但从总体上看,历史仍然是在“否定之否定”中由低级向高级前进的,这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不可能设想,今天发达的人类社会,经过一个什么周期,又会回到原始的洪荒时代。当然,也有人作过这样的预测和设想,但不过仅仅是预测和设想而已。

那末,周期律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到底存在不存在呢?这个问题只能让历史本身来回答。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告诉我们: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但历史的某些重演现象也确实存在。1882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对德国历史学家毛勒说过这样的话:“他具有‘开明’的成见:似乎自从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必定会不断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进步,这不仅妨碍他认识真正的对抗性质,而且在妨碍他认识个别倒退情况。”^④这就是说在看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时,如果注意不到历史上的“个别倒退”现象(有时是重演现象)那就会陷入不可自解的迷茫之中。

历史现象的某些周期性重演,特别是象马克思提到的那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成了不时萦绕人们脑海的疑团:怎样解释和看待这种历史现象?能不能掌握它?如何从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学者在思索,政治家也在思索,后者的思索比起前者来也许更为现实和深刻。前面提到的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正是毛泽东思索已久,并且对它的解决早已胸有成竹。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写成了历史名著《甲申三百年祭》,3月19日至2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对李自成起义军的崛起、发展和失败,作了生动的评述,特别着重总结了这支队伍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一是骄傲自满,由于“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领袖们“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二是不能保持革命队伍初起时的优良作风。三是“屠戮功臣”,这个“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同样没有例外,以致领导集团核心解体,终于酿成了“一场大悲剧”。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方面立即有人干预,说是“影射当局”。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进行攻击,延安则备加赞赏。4月18日至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随后,延安和各解放区都印成了单行本,并被中共中央列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毛泽东讲到印行此文的目的,就是要“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⑤。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函郭沫若,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⑥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这篇文章,就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农民战争受恶性周期律支配的一个重要原因。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金,没有一个不是走着这样一条道路。当然,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民阶级还不是一个先进的阶级,但“小胜小骄傲,大胜更骄傲”,不正是小胜小失败,大胜大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吗?农民战争摆脱不了周期律的支配,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就更清楚了。黄炎培在和毛

泽东的谈话中,对历代王朝的兴衰作了这样的评述:大凡一个王朝在创业之初都雄心勃勃,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及至功成之后,就逐渐惰性发作,松懈腐化,其结局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都无法跳出周期律的支配。其实,黄炎培看到的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现象,世界各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确实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历史现象的重演,纷繁复杂,往往要过很长时间以后,人们才会惊奇地发现其中的奥秘。16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有句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认真地研究历史,特别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们的眼光就会变得深邃一些,思想上就会多几分智慧的闪光。周期律用来研究历史,也许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规律,但至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不过,这种现象既然可以被认识,那末也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了。一般说来,周期律的表现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是难以预料也难以避免的,这极为个别。一种是可以预料同样难以避免的,如封建社会改朝换代和农民战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等。一种是不论是否可以预料,都有可能经过主观努力加以避免或者转化的。黄炎培说他对“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是有所了解的,恳切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周期律的支配。距那次谈话到现在已经46年了,黄炎培担心的周期律对共产党起作用了吗?

中国共产党受“周期律”的支配吗?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并为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工具。资产阶级政党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也是这样,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永恒的政党。但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政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①“阶级消灭和政党消灭,是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把这个过程,即把阶级、政党的产生到消亡,当作一个周期来看的话,那末,这个周期对中国共产党也并不例外,只是这个周期的实现,对共产党和与它对立的其它剥削阶级政党不同,那些政党差不多都是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在战战兢兢中走向灭亡的,而中国共产党则是自觉地创造条件,满怀信心地促进自己消亡的。

当然,我们说党的消亡,丝毫不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恰恰相反,目的是为了很好地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只有现阶段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促进未来阶级的消灭,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从而最终完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由于我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大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算起,至少也要上百

年时间,而到共产主义大厦的建成,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这个时间究竟多长,谁也不好预言,但是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这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全部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或者说这个周期的实现,而不是摆脱它,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努力为之奋斗的。

既然如此,周期律的消极作用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否还存在呢?

回答是肯定的。凡是稍懂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没有一个政党,象我们党这样饱经忧患。70年的岁月,在人类历史上不算很长,但对我们党来说,70年的每一天差不多都深深打上了不平凡的印记,记录着不寻常的业绩。谁能想到,1921年屈指可数的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竟能这样迅速地发展成一支强大无比的力量。就是这支力量,挽狂澜于既倒,救民族于垂危,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就是这支力量,经过和旧势力的反复较量,终于把自己的敌人送进了坟墓,把民族的耻辱柱连根推倒;也就是这支力量,缔造了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人民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民族复兴开辟了宽阔的大道。然而,在看到这些激动人心的成就的时候,更应该看到,这些成就取得是何等不易。正象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写道的:“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⑧这几句人们经常喜欢引用的诗一样动人的短句,实足以说明巨大成就所必需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国共产党异常丰富生动的历史对此作了极为深刻的注脚,本文不再赘述。这里只想说明一点,就是在付出正常代价时,也有一些不该付出的不正常代价,难道这不正是黄炎培提到的那个周期律的消极作用吗?毛泽东对此深有警惕,他及时总结经验教育全党。民主革命时期有好几次都是当我们党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的时候,却令人痛心的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了挫折。这里还是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吧!这段引文虽长,却非常值得一读:“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⑨社会主义时期也没有例外,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轻率发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一个好端端的共

例外，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轻率发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一个好端端的共和国重新拖回到快要“死灭的时代”。这方面的情况，人们知道得不少了，没有必要再举更多的例证。

这些胜利声中的严重挫折，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周期律的消极作用，对中国共产党同样也是存在的。但是，存在的东西，并不等于支配的东西。周期律对中国共产党的消极作用虽然存在，却起不了支配作用，正象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黄炎培的谈话，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周期律的支配。事实也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几经磨难，不是又都胜利地走了过来，而且比过去更加成熟，更加壮大和坚强了吗！

为什么周期律对中国共产党不能起支配作用呢？原因很多，就其主要者而言：

其一，取决于党的性质和党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政治素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锋队这个名词没有人不会解释，但是，只有把它和工人阶级的先进阶级性联系起来，才会加深对党的性质的理解。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政党团体出现过不少，不过大都是昙花一现，真正有影响的为数寥寥，而且没有那一个政党能象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样，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历史选定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没有那一个政党能象中国共产党这样深刻地懂得历史的发展规律，牢牢掌握时代的脉搏和自己的历史命运。特别由于中国共产党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遇到的困难极大，碰到的新课题极多，书本里没有现成的答案，照搬别人的经验往往吃亏，一切必须依靠自己去独立探索和奋斗。特别复杂的环境，异常艰苦的条件，就使中国共产党不仅练就了敏锐的洞察力，而且练就了特别顽强的战斗力、惊人的韧性和毅力。

正是依靠着党的这种性质和特有的政治素质，在70年的战斗岁月中，虽然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险和考验，击沉航船的惊涛骇浪也罢，或是令人陶醉的胜利欢呼也罢，我们党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管是失败后的胜利，还是胜利后的失败，每一次我们都能自己校正航向，自己克服自己的失误，即使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灾难的内乱，仍能转危为安，党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制度没有改变，我们的党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仍然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既定目标奋勇前进。不仅如此，几经波折，党反而愈战愈强，更多地增加了锐气和活力。

其二，取决于党的根本宗旨和据此培育起来的公仆意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公仆，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全都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了人民，因此，党一刻也离不开人民，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不断地强化公仆意识，才有存在的价值和依托，也才能保持强大生命力。邓小平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

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⑩”刘少奇也特别强调:“为人民做长工,要提得响亮。鲁迅先生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的干部、共产党员要甘心为老百姓做牛马,凡不愿意给老百姓当长工、做牛马的可以退党,⑪”几十年来,我们党一贯这样教育党员,这是我们党常胜不衰的重要保证。

要当好公仆,就要发扬民主,依靠群众的监督。毛泽东在和黄炎培的谈话中,谈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跳出周期律的新路时说: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至“人亡政息”。可见,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何等的高度。黄炎培认为这个回答一语道破了长期困扰他的周期律问题。他写道:“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他在访问延安的日记中盛赞解放区的民主建设:“中共军队每到一地方,必首先争取民众。现时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使民众站起来,聚拢来,让他们自由投票选出他们所认为满意的人,做这一地方的乡长或其它公职。军队绝对不参加意见,地方政治,就让这地方民众去监督。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兴奋地出心出力。”这是一位党外朋友眼里的解放区民主,其实,他没有了解到的远比他了解到的要广泛和深刻得多,也许他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怎样艰苦地进行民主建设,不仅给了人民神圣的民主权利,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帮助不识字的老百姓,用投豆等简陋朴素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党正是这样依靠人民,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才胜利地打下了江山。全国胜利前夕,党和毛泽东一再谆谆告诫全体党员,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执政党的地位确立以后,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经受了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没有忘记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在各种考验面前,始终不失共产党人的本色。深深打动人心的焦裕禄式的人物的出现,正是党的这种优良传统长期培育的结果。

但是,执政党的地位,对我们党的考验又是多么严峻。照理说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决定了人民深恶痛绝的那种脱离群众、无法无天和贪污腐化等不良作风,是不应该出现的。可惜一切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个人品质固然从来无法等量齐观,有真善美就会有假丑恶,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建设、法制建设没有走上轨道,人民难以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在建立自己政权以后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国家工作人员追求升官发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⑫”这里的“主人”就是指“官僚”,列宁后来作过这样的解释。所以强化公仆意识,不仅要靠教育提高个人的素质,而且要靠健全法制,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说到民主,由于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民主曾经遭到严重破坏,后来又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因此一些人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不愿受任何法制的约束,使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

又有抬头,这是对民主和法制的双重错误理解。民主和法制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只有正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人民才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它标志着民主法制新时期的到来。这些年来,我们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开始加强了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多年党的建设的经验,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用法纪化的形式把党同群众的联系固定下来,进一步强化了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公仆意识的作用。切实执行,它必将大大推进党的民主建设,使社会主义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取决于对国情的认识和能否制定符合国情的正确路线。

20世纪初,列宁研究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学说,并且把它在落后的俄国成功地付之实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社会主义革命怎样才能取得胜利?胜利后又怎样进行建设?除了党的领导等必要条件外,关键就在于能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国情问题。他坚决反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前提就是弄清国情。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实际作到就很困难,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十分成功。他悉心研究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阶级构成,经过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党的领导人的努力,正确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他提出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科学分析;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道路的理论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不到,却又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政策。但是,由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没有确立,毛泽东思想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党内把资产阶级或者当作革命的领导,或者当作革命的对象;或者认为民主革命的结局是发展资本主义,或者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同步进行等,所有这些错误,根源仍在于对国情认识的错误,结果无不给革命事业带来惨重的损失。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正确认识了国情之后才取得的。

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如此,当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迸发出来的时候,怎样引导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成了党所面临的一个十分

重要的问题。经过几番波折的教训,我们终于弄清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在我国,虽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作为一种制度和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由于我们原来的底子非常薄,起点非常低,人口又非常多,加上不平衡、低水平、多层次的生产力和多性质、多样化的生产关系,决定了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正是根据这种国情,党总结了过去脱离实际几次经济上大起大落的教训,逐步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正确地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断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自觉地加以调整,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健康发展的势头。可见国情问题何等重要,合国情则得民心,得民心则事业兴,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正是合国情、得民心的必然结果。

总之,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更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必然兴衰。周期律支配不了中国共产党;她一定能够跳出周期律,胜利走向理想的未来。

跳出“周期律”的再思考

中国共产党既然能够跳出周期律,是不是就不用着什么担心了呢?

显然不能这样。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它和周围条件的复杂联系,事物的发展并不只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性,而常常是互相对立,不断斗争的两种相反可能性同时并存。要排除不利的可能性,争取有利的可能性,并把它变为现实性,就必须以高度的警觉,努力进行转化工作。电影《开国大典》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后,毛泽东回到家里,心潮起伏。毛岸英进来点燃一支烟说:“你应当高兴才是”。毛泽东说:“当然高兴。不过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接着毛泽东说他忽然想起黄炎培先生那次访问延安的谈话。他把谈话内容向毛岸英重新叙述了一遍。大业初成时领袖的深思远虑,给了我们多少启示啊!

不错!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周期律的支配,这无论从主观条件看(党的性质、宗旨和路线等),还是从客观条件看(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我们都有足够的把握。但是,值得再思考的是,历史发展趋势这个客观条件,虽然具有不变性,而党自身素质的诸多主观条件,则带有相对的可变性,这就需要我们格外小心。社会主义事业比起民主革命是要艰巨和复杂得多的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它不但要经历更长的时间,而且会遭到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因而周期律的威胁也可能更多。如何跳出周期律,关键就在于能否始终保持主观条件的绝对优势。从建国后40多年的风雨历程和经验看,以下

几点极为重要：一是任何情况下都千万不能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由于我国经济本来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当前又面临着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因此，一定要切记过去吃过不少苦头的教训，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力搞好经济建设。只有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得到实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充分体现，周期律的威胁才有可能对我们无能为力。二是要把充分发扬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⑩我们一定要在教育人民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有效地实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如此才能增强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调动人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只能是一个逐步完善和渐进的发展过程，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裹足不前，这一点应该让人民充分理解。三是高度重视党自身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及人们普遍关心的廉政建设等等，这与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比较起来，更具有决定性，它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由于我们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度建党的，几千年积淀的小生产习惯势力和历史上的封建特权思想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加上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滋长，以及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党内和社会上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特别是今天世界局势严重动荡，西方敌对势力又加紧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这就使我们党不能不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如果丧失警惕，不能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难免就会出现毛泽东早就警告过的那种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怎么掉的危险，看来这关非危言耸听。所以，我们一定要切记历史上恶性周期律的教训，不忘前车之鉴。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他的脍炙人口的名作《阿房宫赋》中，记述秦国穷奢极侈而倏忽灭亡的教训后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中国共产党人最善于总结历史教训，最善于作矛盾的转化工作，是绝不会让这种恶性周期律重演的。

谈到转化，还有一点值得再思考，这就是周期律的威胁不仅有可能制止，而且也有可能引导向相反方向转化，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这从我们党走过的胜利——挫折——再胜利的道路，就可得到有力的证明。这里的关键是增强信心，坚定信念，不管风吹浪打，义无反顾地朝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进。信心的启动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维。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看待成就和失误、进步和不足、光明和阴暗，长自己的志气。建国后，党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付出的代价虽然不少，周期律的消极作用也确曾发生过影响，但是，我们得到的却不知要比付出的大多少倍，不断公布的令人目不暇接的统计数字和百分比，可以说明成就的显赫，但还不足以说明它深刻的内涵，最重要的是我们党已经探索到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这就是在邓小平倡导下，从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所作出的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正是根据这条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我们才得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疆场上纵横驰骋,现在已胜利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三步走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巨大成就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个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另一个新的战略目标又摆在我们面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建议,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为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描绘了一个更加宏伟的发展蓝图,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抓住历史机遇,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去,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未来属于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

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周期律,这是我们的坚定信念,但信念的实现,还要靠今后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否则周期律的消极作用还可能无情地给我们以影响,因此,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黄炎培和毛泽东的谈话以及电影《开国大典》中那个镜头,至今仍然对我们深有启示。

注释:

①黄炎培:《八七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本文所引黄炎培与毛泽东有关谈话内容及访延日记等,均见该书所附《延安归来》一文。周期律黄文作周期率,按率指比值,律指规律、法规,此处宜用律字。另在自然科学中只有周期律而无周期率的概念,故本文一概从律。

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

③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④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23页。

⑤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901—902页

⑥毛泽东:《致郭沫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1357页。

⑧李大钊:《牺牲》。《李大钊选集》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⑨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01—902页。

⑩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文选》(1938—1956)第201—

202 页。

①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90 页。

②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 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5 页。

③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54 页。